

探索强国之路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梁祖晨 秦 辉 许 强◇著

探索强国之路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梁祖晨 秦 辉 许 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强国之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梁祖晨，秦辉，许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6006 - 0

I. ①探… II. ①梁…②秦…③许… III. ①国有企业—企业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13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低下，我国国有企业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强势内生驱动，从而显示出新生产权关系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是本书作者梁祖晨教授等多年不懈探索研究的主题。

本书作者指出，西方国有企业从属、服务于私有制经济，占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私有制企业产权归属清晰，同占经济发展主导地位我国国有企业对比，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人格化缺位，从而需要深入探讨揭示企业本质，立足从根基上构建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独特出发点，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作者基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从根本上归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并突出体现于国有企业员工身上，认为应像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取得意想不到的收效一样，通过与深化改革一致的新利益主体的形成，即所有国有企业员工应有权益的市场化兑现，来推动改革不可逆转地深入高效发展。如同国有企业员工需要竞聘上岗就业获得劳动报酬一样，通过面向市场的公正、平等竞争上岗任职，有组织地共同担负国有企业所有者权能，分享国有企业经营剩余中的相应份额。这样，通过实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致使身处逐步深入市场化改革的所有国有企业员工，不仅有竞争上岗任职后获取相应劳动报酬和企业经营剩余的利益驱动，而且有履职绩效的约期动态考评和职位替代等潜在下岗离职威胁，从而严格行使和切实担当国有企业所有者监督国有企业营运权能与职责，并竭诚辅助和服从同为国有企业所有者成员，与其共担国有企业营运风险的经营者工作，勤勉发奋投入群体协同的创造性劳动。这是一家之言，可供对此问题有兴趣者研究讨论。

本书作者指出，为突破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硬壳，在混合所有制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趋势下，实现国资流转顺畅，促使人力资本这一活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属性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似可尝试实施国有企业员工市场化竞争上岗劳作，并实行国有企业所有者权责履职绩

效动态考评中的“末尾淘汰制”。或在不同属性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双向选择”中，实行员工竞争上岗任职的“优者胜”。从而在国资流转顺畅和放大国资功能的同时，突出显现同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具有创造性潜能的不同企业员工，平等竞争上岗就业和促进国有企业高效营运发展。作者认为，这样做可以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巨大经济社会效应。

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提供尽可能妥善可行的理性思维建议，作者通过对诸多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创新实践的实地调查访谈，证实了新生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受制于传统陈旧思想观念的制约。与优良传统有着不可割裂血脉关联的先进文化价值取向的确立与传播，还要凭借制度的先行创建完善，从而促使人们形成完全不同于既往的人格精神面貌，形成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关系。作者由此得出了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有着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参考借鉴意义的结论。

其一，为实现国有企业所有者人格化到位，使国资拥有与持有人存亡与共的强烈保值增值“活的灵魂”。作者并未将国有企业出资人，依旧含糊默认为难以区别其公益或营利属性的行政机构，或像逆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将其相对笼统地归属于难以向个体落实的“集体经济人”，而是将其定位于构成企业或团队的最小决策行动单位，并在整体上是不可分割的国有企业员工个人。同时，作者亦立足于经济学研究，必须要先决性判别界定何为人的交易理智特性，认为作为共同拥有财产权益的所有国有企业员工，同样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当然，又不可混同于西方私有制企业的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整体性占有国有企业产权，并且在协同共谋福利中，深刻认识到自身未来与他人收益及整体发展的密切关联，因而能够理智把握求取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正确路径取向。而不像西方产权私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常会在唯利是图、欺瞒哄骗，甚而是在钻营倒把和巧取豪夺中陷入损人害己的“怪圈”。由此，即应当对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假说，进行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再认识。显然，在产权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利益对立和鸿沟，尤其是存在着资本雇佣驱使劳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和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条件下，很难想象人们在刻意谋求和维护自身生存，或盲目追逐利润、无意顾忌他人，以求一己暴富的过程中，会产生忘我利他的思想观

念。以致使这样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理性，难以规避地处于狭隘、短视的低层次。

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条件下，如果没有出资人就不可能存在代理经营者。以致在所有者有偿让渡产权和严密监控下，逐步形成了影响和推动现代经济高效发展的，职业化竞争担负企业经营职能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由此，作者把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民主参与企业营运管理看成涌现于他们之中，或深受群体价值取向熏染并与他们真诚相处，从而由衷代表员工利益和高度集中群体智慧，具有超前改革创新魄力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产生的深厚土壤。同时作者认为，如果以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以企业家才能来诠释企业家概念，不仅深刻体现出为承担创新职能的企业家才能的稀缺，更人格化地凸显决定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精神，是最为珍贵的稀缺资源。所谓企业家精神，在本质上集中体现为富有市场开拓和科技与管理有机融合创新灵感，并且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自觉性。

其二，基于区别传统产权私有制的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人格化，必然包含有人的思想观念转化和道德情愫提高。作者在制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中，又引入了道德，并且深入剖析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关联。认为虽然道德观念的转化需要社会制度的演变，但是制度的有效运行又依赖一定道德理念驱使下，人们的自律行为来弥补其局限和不足。虽然那种高尚道德情操和事业心、责任感的产生，基于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内在驱动，但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扬，又要以人们道德观念转化和道德行为的改善，即以我国新型市场体制创建完善中，充分理性“经济人”的成长为重要体现和支撑。因而在三者的相互关联中，在实施起先决性作用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时，不应忘记更为深层次的在党风转换和党的引领示范带动下，当前那种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不良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时代变换所不容的陈俗社会风气的转化提升，从而使人的道德向善，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三，为使当家做主人的民众在具有民主选举权的同时，不可或缺地拥有民主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权，深入强化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中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深刻体现党的理论创新中最具价值的思想理论结晶“人民本体论”。作者大胆建议是否可尝试由基层做起，即在我国体制转轨中已形成“经理行政指挥、党委保障监督、职工民主管理”三位一体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使国有企业职代会成为权力机构的同时，在当前深化

改革中严格行使其应有权能的基础上，经由所有国有企业员工民主推荐评议和平等竞争选聘，组建形成同样为权力机构的地方与全国职代会，并最终使各级职代会成为地方和全国人大依法确认的下属机构。依此，地方和中央国资委的构建及其成员尤其是负责人的确认，也应参照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在参考各级政府所推荐的人选，并且经由相应层级职代会的推举、评议和提名，最后在公正平等的竞争中选拔任命。其所有成员的收益理应与行政人员有别，皆应与国资局部和整体营运成效挂钩，从而使各级国资委不再兼任运动员与裁判员，顺应市场主体确立的逻辑，成为由平等竞争市场机制裁决取舍的经济组织。使各级国资委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亦即在国有企业所有者人格化依然扩展至全国国有经济整体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我国国有经济成为充溢市场竞争活力的经济发展主导力量。因此，所谓的国有企业所有者人格化，其本质正是在所有国有企业员工应有权益的市场化兑现，即本与国资委成员同为一体的所有国有企业员工，基于对自身命运与国有企业未来不可分割，而严格履行所有者权能和忘我投身生产营销劳作，逐步成长为有力支撑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强盛的充分理性的“经济人”。

我非常乐于给本书写序，尽管我认为作者的一些构想仍需作出更为充分的论证。当然，如果作者能够有对与其研究密切相关的同类或近似企业的跟踪调研，将会使其论述和构想更有说服力，甚至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希望作者今后能够拿出更为深刻的研究成果。

张卓之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支撑我国体制创新的中流砥柱·····	1
第一节 由兴盛走向衰退的西方和苏东国有经济·····	1
第二节 西方和苏东国有经济衰退缘由及我国国有企业的 特殊重要地位 ·····	11
第三节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	24
第四节 立足东西方比较研究，探索富企强国之路 ·····	33
第二章 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和管理体制创新 ·····	40
第一节 企业的产生及其形态演变 ·····	40
第二节 企业本质探讨 ·····	45
第三节 人的理性转化与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所有者权益市场化 兑现中的博弈分析 ·····	55
第四节 基于制度与文化互动关联的我国国有企业现代 企业制度和管理体制创新 ·····	71
第三章 东西方传统文化比较及制约我国体制创新的 传统观念考察 ·····	81
第一节 东西方传统文化渊源及相互差异的比较研究 ·····	81
第二节 影响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创新变革的传统 文化考察维度确立 ·····	89
第三节 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创新 成效考察及调查问卷设计 ·····	95
第四节 基于调研数据分析的我国传统文化与国有企业管理 体制创新成效关联求证·····	103

第四章 各国市场体制比较	117
第一节 国有企业监管模式与不同市场体制的关联	117
第二节 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118
第三节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市场体制	122
第四节 日本“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126
第五节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129
第六节 国外市场体制确立中值得借鉴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133
第五章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国际比较与我国国有企业 所有者人格化	138
第一节 契约解构、产权制度安排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138
第二节 美国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特征	145
第三节 日本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特征	153
第四节 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攻坚：基于权力制衡的 国有企业所有者人格化塑造	164
第六章 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及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创新	178
第一节 美国公司治理中的国家立法和“个人主财产权” 意识导向	180
第二节 日本公司制企业的主银行制度	183
第三节 德国公司治理中的“双重董事会”制和“全能银行” 核心地位	186
第四节 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与发展趋势	188
第五节 博采众长和继承传统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	193
第七章 企业家成长机制构造与社会主义企业家的造就	216
第一节 企业职业化经营及以企业家精神界定的企业家概念	216
第二节 企业家成长机制及其运行的前提与基础	222
第三节 企业家成长机制运行的环境约束	227
第四节 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培育与造就	241

第八章 国资授权经营与国有控股公司运营管理·····	249
第一节 外国国资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250
第二节 国有控股公司特性与经营定位·····	254
第三节 结构调整与国有控股公司改革·····	257
第四节 成功案例：上海仪电国资改革 15 年 ·····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记·····	287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支撑我国体制创新的中流砥柱

第一节 由兴盛走向衰退的西方和苏东国有经济

在寻根溯源的学术研究中，常被称为“官办事业”的国有企业自古有之。它伴随国家这种行政地域建制的产生而崭露头角^①，随着社会经济的衍生进化而演变，及至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国有企业。这说明它作为社会生产中特有的经济单元或经营组织机构，在各国皆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同时，亦如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历经不同的兴衰际遇和寿命周期一样，国有企业也不例外。考察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史，不仅可以看到它们有着久远不息的生命延续，早在17—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即以机器大生产的方式在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横空出世。而且在几经抑扬波动之后，又特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耐人寻味或值得深入探讨发掘其内在原因的大起大落。

一 国有企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曾有着久远的存续兴衰史

作为西方经济学支柱的价格理论，其核心或立说根基，是强调财产权益有明晰归属的个人所有，即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人的理性本是自私”的基本设想或假定出发，把确有切身意愿和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自主交换私有产权和资源稀缺有限条件下刻意求取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利己动机，看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动力。这样，在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导向操纵下，本为谋求自利或自身产品价值得以兑

^①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我国就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官营手工业作坊。

现的初衷，反而会有效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发展。然而，在产权私有、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发调节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却很早存在着另一种产权归属或资源营运模式，甚至有着不同经营目的的国有企业。

具有相对营运规模的西方国有企业问世，最早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如英国早在 1657 年即由政府出面创建了属于国有企业性质的世界第一家现代邮政局。^① 法国于 1810 年成立的烟草专卖局，也是以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出现。这在西方资本主义诸国竭力实施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几乎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并不多见。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样隶属辖制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同样应引起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需要，曾一度使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促使国有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如美国政府在 1915 年获得了阿拉斯加北方铁路公司的股票所有权，在战时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又先后创办了多家国有企业，并且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部门置于国家的垄断经营之下。英国政府亦从 1914 年 8 月开始几乎把全部铁路以及大批重要企业收归国有或国营，形成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法国政府除在 1870 年颁布烟草、火柴的“国有制”法令外，又于 1914 年对酒精实行国家垄断，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巨资于公路、铁路、海港、水电、化学和制药行业以着力兴建国有企业。这样在战争中由国家集权兴办某些需要统一筹划运作的产业，不仅有效适应了战争时期的特殊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领域企业的营运发展，显示了在价格自发性调节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实施适当干预的必要性和国有企业存在的相对优势。随着战争的结束，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把强调产权私有和维护生产竞争中的“自由主义”作为体制重建的基本取向。所谓传统“正规”的市场经济模式被着意全面恢复，战时所实施的国家控制经济的大量举措均被弃置。如美国在战争刚刚停息不久，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清理，使之大部分回归私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变得十分虚弱，美国又恢复了它的孤立主

^① 本节某些数据和资料，主要参考或转引自顾宝炎主编《国外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革》，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 页。

义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失去“领头羊”的情况下，所谓“纯粹”和盲目的自由市场竞争直接造成了原本即蹒跚行进的经济急剧混乱，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 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在世界性危局中，犹如天塌地陷般的众多企业纷纷倒闭及大量失业者的如潮涌现，致使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市场体系的重建工作，力图使企业利润和工人收入恢复到正常水平。国家干预之风振荡着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及至 1929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即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干涉，先后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一发生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首先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然后扩大到工业生产和流通分配。在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等，亦把工业和农业生产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如意大利政府为应对银行业危机，于 1933 年成立了国家工业复兴公司即伊里公司。法国在 1936—1938 年也酝酿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分别将铁路、法兰西银行及某些军用品生产部门，置于国家的严格监控之中。还应提到的是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即利用预算建立了 2600 家国有企业。时至 1945 年年底，所有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按 1958 年价格核算已达 17 亿美元。

从对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早期国有企业产生发展史的回溯分析可明确看出，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存续延伸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代替政府承担公共事业或公共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的建设职能，而战争则是推动国有企业强化的重要因素。与西方诸国相对应，立足于生产关系或产权制度的变革，探索开启企业营运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新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其确立和繁衍的历史轨迹与前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早在 1917 年年末到 1918 年年初的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即将全俄银行收归国有，并且紧随其后实施了工业国有化。如列宁在俄共（布）“七大”宣布的共产党在经济方面的根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将所有工厂、铁路、银行、船舶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① 时至 1918 年年末，在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的条件下，苏维埃成为集中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它“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

^①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草案草稿》，《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6 页。

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机体。”^①在此期间，于1918年秋发生的武装干涉和自卫军进攻，打断了俄德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后短暂的和平建设。为保证战争的需要，按照军事化的原则改组整个国民经济，即以固定的收购价格对各产粮省农民实施余粮收集制，同时关闭市场和禁止粮食交易的“战时共产主义”，恰巧为工业领域高速建立严整的计划经济制度提供了机会。

1921年春召开的俄共（布）“十大”，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随之而实施的废止余粮收集制和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交换和恢复商品流通，显现出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难以适应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变化。如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关于工业的决议》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就一定要给各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②党应当“学会使国家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一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结起来，并根据对经济行情的经常研究调节市场关系。^③这样的政策方针变革，不仅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而且使战乱后的工业经济得到迅速调整发展。

然而，起始于1928年前后由斯大林主持领导的苏联经济，却与新经济政策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1929年4月召开的全苏第十六次党代会提出，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相适应的有关管理体制的基点，即实行高度集权中央的计划部署与领导。如斯大林在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所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④由于整个经济生活和所有经济部门开始了直接的计划化，除集体农庄市场外，市场多半成了国家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流通领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逐步充实完善，完整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18年3月7日），《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0页。

③ 1924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85、391页。

④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7年1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的计划经济体系最终得以严格确立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与古典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下生产单位的显著区别，即在于前者实行经济核算，因而取得了“企业法人”的外衣，成为国家统一经营管制下的生产加工厂或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的附属工具，亦即难以真正确认其企业属性的“企业”。这样的经济核算，实质上亦仅是与企业面向市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脱钩的成本核算。因而所谓的“国有企业”，也仅仅只能是国家整体性“大企业”下属的生产环节或成本中心，而并非拥有企业本能或权限的投资中心和利润中心。尽管这样管理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市场需求缺失及有效成本核算或营运效益求取的支撑基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或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认识的不足及在一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如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和战后经济发展某些领域中取得相应突出的成就，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相继效法的“标准化”样板。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前所未有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促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深入诘问反思，一向所恪守的传统自由主义市场体制中的固有积弊，开始在理性思维和实践探索中逐步强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必要干预。寻觅和谋求能够有效规避防范周期性危机爆发的新的经济运行模式^①，强化具有重要影响制约作用的经济组织机构设立。英国自 1945 年开始即将一系列基础性工业和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20 世纪 50—70 年代由政府出面建立了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有企业，如工业复兴公司和国有企业管理局等。法国亦于 1945 年开始了风靡一时的国有化运动，将包括电力、煤气和煤炭等在内的能源部门，含 32 家保险公司的保险部门，拥有四家最大储蓄银行的金融部门及其他一些公司，如雷诺、伯利叶和法国航空公司等全部改由国家接管，从而使法国所有国有企业总产值一度达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5。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积极发展国有企业。其重要举措有整顿和加强原有的伊里公司，组织管理石油部门的国有股份公司，设立国家参与部，将电话部门置于伊里公司的管理之下，同

^① 凯恩斯在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即摒弃了以前西方经济学关于自动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机制的学说，提出了国家调节经济的主张，认为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资本主义就会灭亡。“二战”后其理论不仅得到充分肯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将其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融入经济制度的转换重构之中。

时对电力工业实施国有化，建立制造业持股公司、工业管理和持股公司，并对石化工业大企业进行控股。一向青睐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清理了战时所建国有企业，但同时又继续创办了一些国有企业，并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部门和高技术产业。有资料表明，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在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的投资按 1947—1949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已达到 1567.7 亿美元，占同期国家投资总额的 57.2%。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经济高速发展，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其国有企业的经营规模和数量也有了十分突出的增长。仅中央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就从战争结束时的 7 家增加到 70 年代中期的 114 家。据 1975 年统计，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占国内企业净资产总额的 9.2%，在总的固定资产形成中占 5.1%，在总就业人数中占 4.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迅速扩张，形成了国有企业发展史中极为明显或抢眼的兴盛阶段，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经济，尤其是作为其重要基础或支柱的私有经济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战后初期，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资本短缺、物价飞涨和生产萎缩现象，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经济陷入瘫痪状态。私有经济的低迷衰退和不景气，使得完全依靠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技术更新和扩产投资的策略无法实施。这就促使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担负起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双重重任，由“政府出面、财政出钱和社会出力”来着力兴办新的国有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规模，以期达到在短期内迅速弥补战争创伤和启动经济的目的。

尤其应指出的是，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猛崛起，体现出国家计划在导向、推动和统一组合调配资源，促进经济复苏和重化工业迅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一向以维护“绝对自由竞争”为宗旨的西方国家市场体制的重建，无疑起到了反向借鉴作用。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阐述战后美国经济体制构架中的政府决策趋向时，就曾明确指出也要搞一些计划经济。

其次，战后特别是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席卷欧美，随着以社会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科技革命深入发展，使得一系列新的社会性问题接踵而至。诸如何以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优化市政

建设和兴办福利事业，调整经济结构和完善经济政策，保护生态平衡和治理环境污染，缓和滞胀和缓解社会矛盾等。要综合性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试图单纯依赖分散的社会力量显然是远非其力所能及或可望而不可即，必须要切实实施并相应强化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同时，为推动科技革命深化发展的新技术部门和相应基础工业及设施的兴办，往往投资大、风险高和资金回收慢，在私有企业不愿或没有足够财力进入的情况下，其职能必然要由国家来承担。

最后，西方国家在战后为迅速恢复经济普遍采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促使在实质上即所谓“计划经济 + 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和战后体制重建的核心指导理念。这似乎从根本上成为挽救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灵丹妙药。凯恩斯理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实施赤字财政，即通过国家消费和国家投资的增长，来促进国内市场和整个投资市场的有效扩张，以发展新兴工业并加快改造落后的地区和部门形成混合经济体系。另一个主张即行使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它在税收、开支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巨大控制潜力，来消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性。

这样对于自身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带有反思和修正意向的新的西方经济理论确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批国有企业的创办和兴建，亦即一度兴盛发展的西方国有化运动，曾有效地促进了西方经济从严重危机中的复苏和增长。

三 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东西方国有企业衰退和私有化浪潮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府积极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载体和凭借手段，曾有效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增长。然而，在其运营发展中却越来越明显暴露出自身效率低下的弊端，以致造成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及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日见增高。及至 1970—1980 年，由于欧美各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两大鲜明对比。即一方面是以各种方式灵活营运的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却是国有企业亏损数额的日益积累增多，以至于成为拖累财政增长的沉重负担。以英、法、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为例，可明显看到当时各国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见表 1-1）。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法国老工业区，其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传统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洛林地区的国营钢铁公司却连年亏损。自 1977 年起，